

政治學研究前沿之我見

吳重禮*

社會科學研究主要以「人」為研究核心。舉例來說，社會學的核心概念在於「社會地位」(social status)對於人們行為所產生的效用；個體經濟學嘗試理解人們在「資源有限、慾望無窮」的限制下，如何從事「極大化個人利益」(utility maximization)的決定和行為；政治學著重在衝突對立的情境下，「權力」(power)何時發揮作用、如何對於人們產生影響。無論如何，以人類動機和行為作為研究核心是社會科學領域的共同特徵。

然而，研究人們的動機和行為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；依據個人淺見，近年來，社會科學研究前沿的重要焦點在於兩方面。第一是為了解決「外在效度」(external validity)所產生的研究爭議。第二是為了確保變數與變數之間的「因果關係」(causality)推論。所謂外在效度意指一項研究結果是否能夠適用到其他所有通用案例，較高的外在效度意味著得以將研究結果類推到其他普遍的案例。在因果關係推論方面，研究者對於各種變數前因後果關係的確定，往往是一件困難的事情；以民眾收看政論節目的習慣來說，究竟是因為先有政黨偏好所以選擇收看相同政治立場的政論節目，或者是因為看了特定立場的政論節目因此形塑了民眾的政黨認同。在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上，變數之間相互影響，使得模型估計產生偏差，這種問題被稱為「內生性」(endogeneity)；這種內生性爭議是社會科學研究者經常必須面對的挑戰。

近年來，為了解決外在效度和因果關係推論的爭議，社會科學研究者援引統計學、經濟學、心理學等跨領域研究普遍採取的幾種作法。個人認為，這也是當前政治學的學術前沿，讀者只要翻閱幾本政治學重要學術期刊，每期幾乎都會出現幾篇這種研究主題的論文。首先，是實驗法的普遍使用。實驗設計原來的目的在於控制外在變數，解決因果推論的關係；類似於自然科學的作法，希望在控制其他條件的情形下，能夠觀察某些人類行為的動機，以及因為動機所產生的行為，藉此確認因果關係。

*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

然而，實驗法可能因為外在效度的問題，使得研究結果的普遍性遭受質疑。實驗法所衍生外在效度爭議，最常被提及的實驗就是 1927 年至 1932 年期間，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在美國伊利諾州的「霍桑工廠」(Hawthorne Works) 進行的實驗，所產生的「霍桑效應」(Hawthorne effect；也被稱為「觀察者效應」[observer effect])，也就是實驗對象在瞭解自身認知因為身處在實驗之中，為了符合觀察者的預期心理，因而改變既有行為的反應。

另一個案例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者所進行的學生實驗，以兩人為一組，給予其中一人一百美元，不得獨占這筆金錢，必須和對方分享。藉由分配者如何支配這筆金錢，原本期望瞭解人們對於資源分配是否符合效用極大化的原則。然而，研究結果顯示，在教授的就近觀察之下，學生之間對於金錢的分配違反了這項原則，而是將既有金錢公平地與對方分享。之所以如此，在於實驗對象行為是為了要符合「社會預期」(social desirability) 和觀察者的預期心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經常出現「善意謊言」(white lies) 掩蓋真實的動機和行為，主要是希望符合社會預期；在公開場合、婚宴聚會，或者接受民意調查時，有人高談闊論，發表支持特定政治人物的荒謬主張，或者未必同意訪員所提出的調查命題，多數人即使不同意這些論點，經常選擇心口不一地回應，或者是虛應以對，這其實是為了社會關係和諧、避免人際互動緊張，使得人們的真正認知和行為表現產生落差。這也會產生外在效度的問題，在此情況之下，田野實驗法遂孕育而生。

田野實驗法和實驗法主要不同在於，實驗對象並不知道自己是身處於研究過程中，透過這種方式希望實驗對象忠實地反應自身的想法與行為。一般說來，田野實驗還是會將研究對象區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，控制組是沒有在受到特定變數影響之下原有的行為，實驗組則是在受到特定影響之下行為的改變。藉由控制組和實驗組數據的比較，可以確保因果關係的確定，提高研究結果的外在效度。近年來，普遍的田野實驗包括問卷實驗，例如將受訪者隨機區分為兩組或四組，讓受訪者在不同問卷情境下回答，比較實證結果，甚至只是簡單的「平均差」(mean difference)，就可以得知實驗效果為何。田野實驗法的成敗繫於研究設計的良窳，以確定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。一般而言，實驗設計涉及六個面向：研究目的、研究議題、研究對象、研究時間、資料如何蒐集，以及成本(包含時間、人力、預算)。

另外一種解決因果關係推論的方法，在於使用「定群追蹤資料」(panel data)。這種資料的取得藉由相同一群受訪者，在以相同問卷題目、不同時間點持續進行調查，以確認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。在後續分析時，這種資料經常藉

由「固定效果模型」(fixed effect model, FE) 或者「隨機效果模型」(random effect model, RE) 進行估算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儘管定群追蹤資料的分析甚具學術價值，然而定群調查過程中，拒絕再度接受調查的受訪者成為流失樣本，必須以相近社會人口特徵的受訪者（諸如性別、年齡、教育、地區等）成為替代樣本，這些都會增加研究成本的支出。因此，首波受訪者抽樣人數較多，且之後陸續調查的替代樣本，進行更為縝密的研究設計，雇用更有調查經驗的訪員和督導等，這是研究者必須面對的困境。

除了實驗、田野實驗、定群追蹤資料之外，近年來若干研究者藉由「機器學習」(machine learning)，或者統計方法（如 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）嘗試解決外在效度和因果關係推論的問題。必須強調的是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Clive Granger 所提出的 Granger causality test 已被普遍使用，儘管如此，他也認為這種因果關係檢驗的結論只是一種統計估計，並不能呈現真正的因果關係，也無法作為肯定或否定因果關係的唯一根據。因此，發展更為細緻的研究方法，以檢視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，藉此理解人們的動機和行為，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使命。